

漫议中国抗战文学的世界性

章绍嗣

(中南民族大学 统战部,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抗战作品大批输出”和国外文学大量“输入”,世界各国作家亲赴中国创作了一批反映中国抗日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国的抗战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有力的一翼,具有鲜明的世界性。

关键词: 中国抗战文学;反法西斯;世界性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433X(2005)04-0005-05

正如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一样,中国的抗战文学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阵线的一支重要部队,它在文化战线上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抗战文学的世界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建立了密切联系

当年,面对日益猖狂的法西斯势力,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就向世界发出呼吁:“我们最紧急的一件任务就是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蒂!”^[1]1935年5月“全世界作家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随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阵线逐渐形成。战事初起,由于文艺界尚无稳定的组织和一定规模的活动,中国文学界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联系只是个别、零散和自发的,但情况很快得到改变,中国文艺界大团结的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下同),成立时推举同情中国的作家罗曼·罗兰、威尔斯和艾格丽丝·史沫特莱担任名誉主席团成员,并在其《宣言》中指出:“我们——立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这统一旗帜之下的文艺工作者,盼望全世界中国之友的文学家给我们更多的力量,为了争取远东的真正和平,为了给以摧残文化的野心的侵略者以打击,为了实现人类的和平共处,自由发展,让我们携手共同前进!”又以中、英、俄、德、日、法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发布《告全世界文学家书》,表达了愿与国际同仁携手合作、共同奋战的决心。此后,“文协”即以中国文艺界代

言人的身份,与各国文学组织和社团开始了国际性的文学对话。它密切关注世界文坛的风云变幻,七年中适时发布了《致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作家电》、《中华文艺界全国抗敌协会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致敬》等一系列文告,给斗争中的各国作家以声援和支持。“文协”及随后建立的“第三厅”以组织的名义,派出演剧队、演讲团和展览队等,以文艺形式到国外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上的理解、同情和支持。通过举办欢迎会、报告会、座谈会等,接待了大批国外来华的作家,交换信息,沟通感情,探讨文艺理论与创作问题,促进世界文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通过会刊《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七月》、《文艺战线》、《文艺月报》等报刊大量报导国际反法西斯文学阵线的活动实况。如对波兰流亡作家瓦希莱夫斯卡、被逐出境的德国作家勒格莱尔、马尔夫和翁哈达等的流亡行踪及创作情况的报导,在中国读者面前推开了一扇扇望世界的窗口。随着抗战的深入,诸如“中外文艺联络站”、“中英文协”、“中苏文艺研究会”、“中印文协”、“中比法瑞文协”、“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等,对外交往的文化组织日渐增多,机构逐步完善。通过这些团体和他们所办的《中国作家》、《东方呼声》、《中国吼声》等多语种杂志,与世界各地的作家和社团建立了广泛的联络,在交流战时文学信息、组织作家记者互访、刊载翻译作品及评论、组织文艺理论研究、开展对法西斯文艺批判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也给予中国抗战文学以巨大

* 收稿日期:2005- 05- 30

作者简介:章绍嗣(1942-),男,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抗战文学。

的关注和支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作家协会是第一个声援中国抗战的文学团体,高尔基愤怒谴责日本的“强盗行径”,呼吁“全世界真挚的文学家跟法西斯主义及其丑恶对立起来!”^[2]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作家协会号召文艺界全面开展支援中国的行动,他们集会游行,广播展览,寄发函电,撰写诗文,报告讲演,采取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的声援,《国际文学》、《文艺鸟瞰》、《文学报》等所有文学刊物都大量发表支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作家的作品,并持续不断地翻译出版了数量巨大的中国抗战文学作品。欧美各国文化界在抗战爆发后掀起援华运动,组织了持久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英国诗人阿克兰在演讲中说:“现在战争中中国人民的英勇与坚毅,在战略上的优势,和他们的英雄主义与道德主义,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无匹的文明的前途。这是全世界一切知识分子在反侵略斗争中站在中国一方面的原因。”^[3]这是有正义感作家的声音。被称为英国“左联”的最大文学团体“左书会”,在国内两年间举行了200多次募捐和大型演讲会,他们的刊物《翼评论》上开辟有“援助中国专号”,《日电》是全英中国信息刊载量最大的报刊,组织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王礼锡的《今日之中国》、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攻》等大批反映抗战现实的名著。其后,他们又组织了“全英援华总会”,把宣传、募捐和抵制日货作为自己的三大任务,他们在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致敬电中说:“敝会同人愿竭绵薄以助中国抗战之胜利”,表达了与中国文艺界携手合作共谋反法西斯文学发展的心愿。“美国作家联合会”在30年代就声援过中国的抗战文学团体,1937年在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谴责法西斯势力对西班牙和中国的侵略,著名反战作家海明威发表《作家与战争》的演讲,号召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的文艺阵线。继而大量编辑杂志,出版书籍,制造舆论声援中国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大批作家记者来到中国,采访报导,从事创作,与中国作家风雨同舟。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这种往来,直至二战胜利从未中断和停止。

二、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联系和交流的重要内容

文协在其《宣言》中指出:“在增多激励与广为宣传的标准下,有我们的翻译——把外国的介绍进来,或把国内的翻译出去”,后来又提出了“文章出国”的口号。这里的“出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内组织作品翻译向国外发行。在1939年初成立了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组织了俞大纲、伍蠡甫、宗白华、铁弦、马

耳、梁宗岱、王礼锡、戈宝权、林语堂等翻译界精英从事编译,做了大量的文学进出口工作。编译了多语种的《中国抗战小说选》、《中国抗战诗选》、《中国抗战文艺选集》等向英、美、法、匈牙利等国发行。1939年在香港创办英文版《中国作家》,使不少优秀的抗战作品得以走向海外。“孤岛”上海的金星书店编译出版的《国际文艺丛刊》就包括了美、德、意、日诸国的《意大利的脉搏》《震撼世界的十日》《人的希望》《纳粹的贫血》等一批著名报告文学,大大地拓展了国人的视野。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海明威、辛莱克、奥登、伊粟伍德、阿拉贡、茨威格、巴比塞等一大批享誉文坛的名字在战火硝烟中为中国人所熟悉。二是指国内外合作或由国外友人单独组织中国作品的翻译在海外出版。苏联的《国际文学》是以英、俄、法、德、西六种文字出版向世界发行的著名刊物,为扩大抗战文学的影响,增设中文版,几乎每期都有中国作品发表,还曾刊载“中国抗战文学专辑”向读者推介中国的作家和作品。苏联文学界组织了一批翻译家专事中国作品的编译,罗果夫主持出版了收录有老舍《被占领的城市》、茅盾的《林家铺子》、姚雪垠的《红灯笼的故事》、萧红的《莲花河》等篇章的《中国小说选》。苏联国家出版局出版了肖三的散文特写集《不可征服的中国》、诗集《箫笛》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碧野的报告文学《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小说《半车麦秸》和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由出版家布朗组编在美国发行。英国作家约瑟夫卡尔玛将司马文森的《雨季》、《人的希望》、《危城记》译成英文编入《中国短篇小说选集》在各国发行。苏联出版的俄文版《中国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司马文森等人的大批抗战小说。艾芜的小说《山野》被匈牙利翻译出版。艾青的《欧罗巴》、《哀巴黎》、《索亚》、《三国公约》、《中国人民的歌》、《敬礼》、《希特勒》、《土伦的反抗》等诗在多种杂志刊载,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仇恨,对于苏、朝、英、法等人民反战的深挚同情和声援。这些作品激起了被侵略民众感情上的共鸣,受到各国普遍的欢迎,南斯拉夫《红星》在评论中说:“这里没有玫瑰和恋爱,有的是残酷的战争,中国人民的苦痛的反抗奴役,争取自由的斗争。这些故事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中国人民有着和善而好义的精神,却断乎不愿意作牛马。”^[4]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中国的作家和作品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了国门。

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名著的“输入”和抗日战争共始终,其成绩是史无前例的。茅盾在《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总结这一工作时说:“从古代文学

直到当代的战争文学,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流离失所还没有自己的祖国的犹太民族,史诗、戏剧、诗、小说,我们的翻译文库真可以说一句琳琅满目”。翻译家们选择的眼光几乎不约而同地投射在遭蹂躏国家的反法西斯文学上,波兰流亡作家瓦西莱夫斯卡的《被束缚的土地》、捷克作家卡普勒的《紫市卡的市镇》、挪威作家特密克尔甫斯托的《他们像朋友似的来了》等迅速被译介到国内。《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都翻译刊载过数以万计的国外反侵略文学作品。仅《潮与潮》编译的《小国作家短篇译丛》就刊载有英、德、法、匈、意、瑞典、挪威等10余国数十篇作品。《苏联文艺》、《中苏文化》、《翻译杂志》、《文学译报》等更是集中报导国际文坛消息和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中苏文化协会设立有曹靖华负责的编译委员会和由郭沫若主持的研究委员会,曾编辑《苏联文学丛书》,出版了多种苏联文学作品。《中苏文化》着力于推荐介绍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曾刊发《保卫察里津》、《带枪的人》等反法西斯文艺作品,并编辑过高尔基、马雅珂夫斯基、莱蒙托夫等的特辑系统介绍苏俄作家及作品。苏尔科夫1944年6月在苏德战争爆发时作的《勇士之歌》,当年10月就被翻译刊载。该刊自创刊到1945年8月,发表有关外国文学的文章达507篇之多。

“孤岛”中的上海作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苏联文艺》月刊,一直艰难支撑到抗战胜利,在三年刊出的15期中,该刊译载的主要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如小说有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阿·托尔斯泰的《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巴甫连柯的《地雷狂想曲》等,诗歌有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阿谢耶夫的《莫斯科人民武装起来》、科拉斯的《献给国土的解放者》,剧本有昂诺夫的《侵略》和考涅楚克的《前线》等。据统计,在抗战期间中国初版和重版的苏俄译本达200余种。其中小说近百种,剧本50余种。这些作品给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翻译杂志》更是责无旁贷以较大篇幅定期在“战时文学”栏目中推出反映各国人民现实生活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苏、波、法等国人民在反抗侵略,保卫祖国中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系统地对苏联的西蒙诺夫、巴甫连科,法国的卡泰耶夫和波兰的瓦西莱夫斯卡等人作品予以介绍和评论。有统计称“抗战八年中,共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达850余种之多”,^[5]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优秀作品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与中国抗战文学作品的相互交流,声势之盛、

范围之广、成绩之大在新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使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获得了思想情感上的交流。这些共同的“精神食粮”,既加深了人类对于反抗暴政、争取和平这一共同事业的认识,又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

三、世界各国作家亲赴中国参加抗战并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

中国抗战文学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大批国外作家、记者冒着战火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促进了中外文学的交流和发展。抗战期间来华采访考察的各国作家记者有近千人之多,他们创作了大量各种体裁的作品,向世界昭示了中国遭受凌辱、英勇抗争的真实,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和关注。最早踏上华夏大地的是英国作家和记者詹姆斯·芒罗·勃特兰,他1936年1月来到北平,这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国陕西的省会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勃特兰敏锐感觉到事态的重大,预测到中国历史的进程将会出现重要变化,便急于12月27日赶赴西安,他不畏艰险,不分昼夜,在事发地作了40多天采访,搜集到大批宝贵的信息和资料,不久就写作了反映西安事变的大型报告文学《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真相》。这部长篇通讯作品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1938年更名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在美国出版。勃特兰在公正和客观的立足点上,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西安事变的全貌,并以精辟的思辩作出自己的评判。这部书重要的史料价值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暗淡,1975年美国竟又一次再版重印。

1937年10月,勃特兰奔赴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访,他拜会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及许多高级将领,又渡过黄河,深入到山西前线的八路军部队中采访。他对毛泽东的访问,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中那篇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其后,他辗转于抗战的前线和后方,相继写了《华北前线》、《战争阴影》等书。新中国建立后,他再度访华,写了《重返中国》。勃特兰的一生和中国的抗战紧紧相连,是中国人民忠实和亲密的朋友。著名的“牛津派”诗人奥登和小说家伊粟伍德,1938年来华,他们采访写作7个月后返回英国,把在中国写的作品整理编辑成《戡地行》一书出版,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们中国之行的全貌。回国后,奥登和伊粟伍德仍然关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他们创办刊物《新作品》发表了不少反映抗战的创作,编辑出版了一期《中国抗战文学专辑》。其他来华的英国作家还有弗雷达·阿特丽和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何登夫人及索

麦菲尔德、潘恩等。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1936年就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救亡斗争,致力于中日文学的交流。他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呼吁“中国应当与日本的人民,以及反侵略的文化人,携起手来!”他常常以日本公民的身份用切身的感受在集会、广播和写作中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作为作家的他辛勤笔耕,相继创作了诗歌《送北征》、《颞香港》、《听见了呀》,长篇报告文学《和平村记》、《我们七个人》和剧本《三兄弟》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歌颂中国正义的斗争,痛斥日本侵略的无耻行径,笔端下流淌着爱憎分明的感情。鹿地亘的作品被《新华日报》称为“日本文艺作家第一次对于中国大众发出的声音”,他被中国文艺界尊称为“日本进步文化的良心”,“日本人民的代言人”,这是中肯而恰当的历史评价。

美国是派遣作家记者到中国最多的西方国家,以《红星照耀中国》闻名的埃德加·斯诺在抗战中又作了长篇报告《为亚洲而战》评述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他的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写过《火地的女儿》的艾格丽丝·史沫特莱一直与抗日军民风雨同舟,她的笔为中国而挥洒,先后写出了《日中国特写: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和《中国在反击》三部著作,这些作品在美国出版后,产生过很大影响。1941年她因病回国后,在国内撰文、演讲,继续为中国抗战作宣传,并完成了《中国的战歌》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两部巨著,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抗战的真实,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佳的战地报导之一”;史沫特莱被周恩来赞誉“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在中国大革命风暴中来中国,写作过《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的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花甲之年,又在1937年踏上了中国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她出席会议,发表演说,四处采访,很快写作出版了《五分之一的人类》和《中国的一百万人》这两部著作,成为1940年的畅销书。此外,苏联作家艾德林、美国作家海明威、格兰姆·贝克、毛那和威尔基、根舍、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日本作家绿川英子、德国小说家安娜·西格斯等都曾来过中国并有著作问世。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世界各国来华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只能介绍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他们带给中国文艺界的是人类公理和正义的问候,是爱好和平人民的关怀和支持,他们的作品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连成了一片。

四、中国抗战文学的变化与战局的跃动紧密相连
中国及国际战局的变化,影响乃至左右着抗战文

学发展方向的调整、文学主题的转换和艺术形式的更迭。在这一点上,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在认识和实践上获得了共时性趋同。当法西斯主义对人类和平猝然发动攻击时,惊恐失措的作家们一度感到惶惑,世界文坛出现过短暂的沉寂,中国抗战文学的活动和创作也有过一时的冷落。当侵略的战火蔓延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后,急剧变化的现实便很快使多数作家清醒过来,他们焕发爱国热忱和国际主义精神,亲赴战场并以文字参与战斗。战时生活的动荡和流徙,使他们失去了深思熟虑,熔铸形象的余裕,结构自由、手法多样的纪实文学几乎成为所有作家们共同使用的武器,纪实文学潮在世界各地汹涌而起,美国作家怀特的《空中皇后的战绩》、贝尔登的《随史迪威将军撤退》;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在特鲁厄尔前线》、《法兰西人民的血》、柯里佐夫的《西班牙日记》、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等作品成为各国风靡一时的读物。报告文学、战地速写、报告小说等纪实作品以不同的语言在各国流行,这是文学服从于战争的一个鲜明特点。人们对于战局的变动密切关注,简单的新闻报导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们希望从迅速敏捷的文艺形式中找到自己关注的有关战争的艺术记录,从生动形象的文学中获取更多信息。广大民众兴趣的转移影响到报刊的编辑方针和书店的出版计划,催动了各种纪实文学的出现。抗战初期编辑出版的《战地报告丛刊》、《战地生活丛刊》、《抗战中的中国》、《抗战动员丛刊》等系列化丛刊有近百种,发表的报告文学近千篇,就是例证。报告文学以真实为生命自不待言,就连小说、诗歌和戏剧也常常是以一个大家关心的事件或一个真实人物为素材进行创作。世界如此,中国也是如此。战争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了作家思想感情和作品的变化,与之适应的艺术形式也发生了变革,大量的纪实作品呈现出色彩丰富的文学景观,如诗歌中的街头诗、朗诵诗和传单诗;戏剧中的街头剧、象征剧、茶馆剧和幕表剧;小说中的墙壁小说和速读小说、广播小说等成为一个时期的文艺主潮,这是一种少有的世界性文学现象。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一样都是在战争的血火中发展和深化着,战争赋予文学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使命,作家的职责要求各国的作家们着力表现“战争与国家”和“战争中的人”;高扬爱国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反法西斯文学对于作家责任的第一命题,是世界文学的共有主题。到了战争的中后期,以多种叙事方式,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弘扬反抗暴力、伸张正义的人道精神,彰显文艺的价值存在和审美意识,是文学发展的必然。随着战争

的持久和深入,作家对战争的本质及规律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们的视野大大扩张,感情逐渐从“踔砺昂扬”趋向于沉实和冷静。战争与文学从趋近到融合,文学发展的进程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不是缓慢而是迅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完成了“亢奋”到“沉潜”的转换,作家们觉得不用鸿篇巨制似乎无法容纳自己的思想容量,从赶写短制发展到“竞写长篇”,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中、长篇小说,抒情、叙事长诗和多幕戏剧。长篇小说如苏联的《宁死不屈》、《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沃洛格达姆公路》,法国的《缓期执行》,美国的《丧钟为谁而鸣》,英国的《三个穿新衣服的人》;诗歌如苏联的《瓦西里·焦尔金》,法国的《自由引导我们前进》,英国的《死的舞蹈》;剧本如苏联的《望穿秋水》、《在布拉格栗树下》,法国的《苍蝇》、《安提戈涅》等成为了记录这场亘古未有的严峻斗争历史的艺术文献。这些作品中爱国主义炽烈情感的喷发,反侵略反压迫精神的高扬,对英雄的渴望与赞美,对法西斯匪徒的鞭笞和审判,在世界和中国人民中激起强烈的感情共鸣。中国抗战文学也在反思的沉静中梳理着自己的情绪,以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将自己对现实的认知化为形象的书写,创作了长篇小说如

老舍的《四世同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茅盾的《腐蚀》;长诗如艾青的《火把》、《向太阳》,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大型戏剧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及郭沫若的历史剧等优秀作品。这批作品在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平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如《四世同堂》展示的是中国人不畏强暴的民族正气,被称为“被征服者的愤史”。它在对中国古老民族文化心理的沉思中,精心镂刻了民族脊梁、民族基石和民族败类三组不同的人物形象,小说在冷峻悲壮的氛围中,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被公认为反映抗战的史诗式作品。诗歌在艾青的笔下律动着忧伤而愤懑的情愫,沸腾着深沉而热烈的呐喊,格调昂扬,意象雄浑,雕刻的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威武群像。

总之,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文学一起,较全面地生动记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与反侵略、邪恶与正义的残酷较量,描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艰苦历程和必然趋势。如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硝烟在地球上飘散已经60个年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现代的文学必须是世界性的。

参考文献

- [1] 焦菊隐. 战时法国文艺动态[J]. 文哨, 第一卷, 第二期. 九期.
 [2] 佚名. 高尔基论中日战争[J]. 抗战文艺, 第一卷, 第九期. [4] 受箴. 世界语的世界文学[J]. 文学月报, 第二卷, 第四期.
 [3] 王礼锡. 英国作家对中国抗战的表示[J]. 文艺阵地, 第二卷, 第九期. [5] 苏光文. 大后方文学论稿[M]. 重庆: 西南师大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王 平)

Cosmopolitanism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out Anti-Japanese War

ZHANG Shao-si

(Department of United Front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Holding the banner of Anti-Fascism,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establishe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World Anti-Fascism Literature. A large amount of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works were “exported” to China while lots of foreign literature works were “imported”. Autho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ame to China and produced a series of great literature works about Chinese Anti Japanese War.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s one part of the world Anti-Fascism literature, represented its cosmopolitanism.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nti-Fascism; cosmopolitanism